

目 录

由延安到两广进行抗日统战工作的回忆·····	云广英 (1)
回忆我在延安十年和在“解总”同美蒋 斗争的经过·····	林 仲 (16)
战斗在敌人的心腹地带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四会、清远、三水边区的 武工队活动·····	林 鸥 (29)
共产党员在南石头监狱中的斗争·····	祝明秋 (52)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 团吉隆坡队·····	黄炜然 (57)
越南北方华侨历史演变概况·····	陈贻泽 (89)
旅美见闻杂忆·····	谢英明 (114)
从香港半岛书店说起·····	杨铁如 (153)
广东民办岐关车路有限公司始末·····	郑助济 (158)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广东糖厂迎接 解放的经过·····	沈子恩 (167)
抗日战争前富国煤矿增资及扩充实况·····	罗贯一 (178)
旧社会汕头客栈的一些黑店内幕·····	邹靖天 (191)
江湖皮相的骗人真相·····	梁心清 (205)
烟花血泪话陈塘·····	存 实 (227)

由延安到两广进行抗日统战工作的回忆

云广英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一九三四年秋，中央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失败以后，被迫进行了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占领了贵州的遵义。在这里，部队休整了一段时间，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从而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在这同时，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和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风起云涌。当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时候，国难当头，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有参加抗日战争的可能性；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在日本帝国主义方

面，已经暴露出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的野心。他们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这就严重地威胁到全中国人民的生存。而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仍然坚持他们的对日退让，对内摧残革命势力的反动政策，也激化了他们内部的矛盾、分裂和斗争。

在这种新形势下，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极为重要的报告，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并明确地指出，目前是全国大变动的前夜，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基本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他们要占领全中国。党中央明确指出：“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面，威胁到全国人民的生存。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置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于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一方面同陕北红军团结合作对敌作战；另一方面对被蒋介石歧视、压制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行统战工作，使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敌为友。这对于抗日力量的扩大发展，出现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我参加长征期间在干部团工作，到达宝安县瓦窑堡镇后，组织上分配我到红军大学政治部工作。政治部主任是杨尚昆同志，副主任是莫文骅同志，我担任政治部组织科长。经过一年时间的长征，经受了艰难困苦，许多干部战士身体都不好。当时陕北地区的党政军民对胜利到陕北来的中央红军非常关心爱护，在物质生活上积极支援，使同志们很快恢复健康，精神上异常振奋。一九三六年六月间，我们听到华南发生“两广事变”，即国民党统治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行“反蒋抗日”活动。并向全国发出：“立即北上抗日”的通电，但详情却不得而知。大

抵过了半个月时间，有一天，李克农同志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来找我谈话。他说：“六月一日两广发生事变⁽¹⁾，广西的李宗仁和广东的陈济棠等联合搞‘反蒋抗日’活动，并发出通电。这无疑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势力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必要和有利的。中央准备派你出去，以红军代表的名义向他们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你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你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冬你又到广西右江参加红七军，你对两广地方情况比较熟悉，我认为你出去活动是合适的。你的意见怎样？”我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完全服从党的决定去工作，不过我从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希望给我多多指示，使我顺利完成这项工作任务。”李克农同志又说：“过几天再谈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你同意出去就好了”。过了三天，李克农同志又到政治部来同我谈话，他说：“中央领导同志今天开会指示你往两广去的工作任务，现在你偕我到中央办公厅去。”李克农同志偕我到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叶剑英、张闻天等同志均已在座。周恩来同志对当时形势作了阐明和分析，并明确地指示我的工作任务。最后又指示我说：“你到南方后，在香港或广州、南宁地区时，如遇到宣侠父，你可以同他谈工作问题，也请他谈当地的抗日斗争等情况，他是进步的人士，他是会帮助你进行工作的。关于你到南方后与中央如何联系，由李克农同志同你详谈。”当我偕李克农同志离开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同我握手时说：“你这次出去工作很好！”我回来后的第二天，李克农同志来指示我到两广后与中央的联系事宜。他与我约定通电报的密码、呼号和波长等。并说要发出电报时，先译成密码，然后托两广当局电台代发，一定要把通电报的呼号和波长告诉他们，那就可以互相联系了。

过了几天。准备工作做好了，我就动身离开瓦窑堡往延安去（当时延安是东北军的驻地）。中央另派白坚同志陪同我到天津，另由东北军张学良部队的一位副官王××带我们乘军用车通过延安到西安。到西安后，王副官带我们到西北军政治部负责人申伯纯的接待室住着。这个接待室只能住几个人，是申接待他私人客人住用的，似乎是秘密的接待地方。我们这次到西安来得到许多方便，无疑是统战工作的成果。

在西安住了几天，我和白坚同志买到一些化装用的服装用具，准备好后，就乘火车往天津去。到天津住在俄国人开的一间中等的旅店，由白坚同志出去找北方局同志联系。过了两天，王世英同志来看我们。我过去没有与王世英同志接触过，这次经过白坚同志介绍才认识。他很热情地同我握手倾谈。我就把我往两广去的任务告诉他。他对我陈述了“两广事变”的情况。他说：“‘两广事变’的真实情况我们这里了解也不太多，但是他们同蒋介石分裂是无疑的，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同我们联合‘迫蒋抗日’是很必要的。听说广东的陈济棠部队中的军长余汉谋事变后已分裂出去投靠蒋介石。因此，目前广东的局势较混乱，陈可能已离开广州往香港了。广西方面没有什么变动，可以往广西南宁去找李宗仁等进行统战工作。”我同意王世英同志的意见。王世英同志另指定一间旅店要我们去住，说到那里去住较方便。我说回去研究一下，下次再来座谈好了。谈到此他就走了。我和白坚同志迁到一间小旅店去住的第二天，王世英同志又来看我们。他个别同我说：“经过调查了解，陈济棠已经逃离广州去香港，你不要去广州，到香港转途到广西南宁去找李宗仁等好了。李宗仁在天津有秘密电台，他们与我们有统战工作上的联系，为了你找李宗仁等的方便，我们与他们商谈过，可以由他们发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告知你不久就要到南宁，这样去会见

李宗仁等就不会那么麻烦了。不过你要改姓名，改为林秀先。这事已同他们谈好了，……”。我说：“照这样办好了。”王世英同志还同我约定以后我回天津时的联络方法。过了两天，我个人就由天津经上海赴香港。在香港住了几天，偶尔遇到我从兄云旭斋，他在澳门经小商，经常到香港做买卖。他把广东情况向我谈了，帮助我了解些情况。我一个人就往广西经梧州到南宁。当我到达南宁要上岸时，船停下来后，就有几个桂系警察来严密的检查，并指定我到南宁某旅店去住宿。我想他们是防止蒋介石派人到来搞破坏活动的吧。检查完后，我就到指定的旅店去住，我用林秀先的名字住下。当天晚上，我写好一封会见李宗仁的信，写好后放在卧床的席子下面。大抵是十点钟左右，有两个警察来查房。他们进入我住的房后，询问我的姓名，从哪里来的。我回答后，他们到处搜查，验查行李后，就翻席子，发现我写的信，即询问这信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又对他们说：“我准备明天去找你们的李总司令，希望你们带我去好吗？”他们说：“总司令部离这里不远，你自己去好了。”谈完后他们就走了。第二天的早餐后，我就拿着给李宗仁的信出去，我发现有两个警察跟在我的后面。我到总部的传达室，即将给李宗仁的信托他转去。不多久，大抵是一个参谋或副官请我到李宗仁总部的办公厅。我进去时，李宗仁正在厅间，他穿军服，穿着一双黑色的长统皮鞋，站立在厅的中间。在厅的一旁还有两个卫兵。李宗仁同我握手并微笑着说：“我早已知道林先生要来，今天得到会面，很好！”他请我坐下后，立即挥手要两个卫兵退出去。接着就向我们毛主席、朱总司令问好。我对他表示感谢。在同他座谈时，没有别人参加。我当时不了解‘两广事变’的真实情况和他们的意图，所以只对他讲如下几点：第一，说明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

国本部进攻，无疑是要占领全中国。最近“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向，严重地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和民族的危亡。目前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坚决抗日，反对内战，反对向日寇妥协投降，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我们党很早就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相信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斗争，这个任务一定能够实现的。第二，我们反对蒋介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政策，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不顾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对日寇不抵抗，对国内打内战，造成了今天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我们认为他们这种顽固的反动主张和行动，是难以容忍的，其恶果是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们红军离开南方北上到西北，其目的是以积极的行动来抗日，推动全国抗日斗争的发展。而蒋介石则派大兵来阻止我们，围攻我们，这无非是帮日寇侵略中国的大忙，大失民心！第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这个武器来组织和团结全国人民大众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汉奸卖国贼进行坚决斗争。我们认为只有走这一条道路才是正确的，才能战胜日寇，才能解放全国，除此别无他途可走。如果国民党当局还搞所谓什么“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继续打内战，对日寇妥协投降，其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我们反侵略的力量，大大方便了日寇的入侵，以至全中国的灭亡，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党中央这次派我到两广来，就是为着商谈关于合作抗日的问题。我认为只有全国各方面愿意和决心抗日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互相配合，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促进全面抗战高潮的到来，那我们就

一定能够战胜日寇，取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我谈这些问题时，李宗仁没有插话，频频点头说：对！对！我谈完后，他说：“林先生所讲的话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完全赞成和拥护。我们正在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希望今后在抗日斗争中我们互相配合。”他又说：“我最近工作比较忙些，我过后通知王公度主任同林先生联系，有什么事情希望与他交谈，……。”我说：很好。他送我出会客厅的门前，我就回我住的旅店。回来时途中没有警察跟踪我。过了两天，王公度到我住的旅店来看我。只座谈半小时他就走了。他把他居住的地址告诉我，并说过后请我去座谈。当时他对我是欢迎的。但‘两广事变’的情况他不多谈。

又过了一天，宣侠父同志来看我，他很高兴，他告诉我香港党的组织已派胡鄂公和黄杰（女）到南宁来，对广西当局进行统战工作。他本人是陪同胡、黄来的。他把‘两广事变’的经过告诉了我。他说，广东陈济棠因为陈部的军长余汉谋投蒋后，广东方面较混乱，陈济棠已去了香港，我们不要到广州去活动。我把我出来的任务告诉他，要他以后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我。我对他说：“我已经会见过李宗仁。李很注意听我的讲话，并表示赞同和拥护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我想他们是乐意与我们合作进行‘迫蒋抗日’的。你认为怎么样？”宣说：“广东的陈济棠部队已经分裂，李宗仁现在比较孤立，他们是愿意同我们党合作的。胡鄂公本人与李济深会谈过，关系尚好。李济深表示很乐意同中共合作，通过统战关系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他在华南国民党地方势力中的威信较高，但是没有实力。他与李、白关系是好的。”宣侠父同志又对我说：“胡鄂公、黄杰同志很想来看您，您是否可以同他们座谈？”我立即回答：“他俩是香港党组织派来工作的，我很想他们来谈谈，多了解些情

况。请你通知他们明天上午到我这里来座谈好了。”宣同志走后的第二天上午，他与胡、黄到我住的地方来。经宣同志的介绍才互相认识。我告诉胡、黄说：“我是党中央派来两广对李宗仁、陈济棠等进行统战工作的。请你们多帮助我了解两广的情况，因为我离开南方七年了。几年来，这方面的情况我不熟悉。党中央对这次‘两广事变’的真实情况也不太清楚。当然早已看到两广地方势力是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蒋介石长期以来对地方势力和进步的民主党派是歧视和压制的。两广当局提出‘抗日救国’的口号，当然是进步的表现。他们实行‘抗日救国’的主张，我们当然是赞成的，是应与他们合作的。我出来工作的任务，是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争取他们同我们一道进行抗日的斗争。我们从多方面进行统战工作，团结更多抗日力量来‘迫蒋抗日’是有利的。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我对胡谈这些问题，他没有发表异议。过了一天，胡派宣侠父同志来对我说：“李济深是拥护我们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的。你是否可以去看他，同他座谈？”我回答宣侠父同志，请你通知他：“后天上午我去看他好了”。早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初期，他表现进步，同我们党有较好的关系。侠父同志告诉我：“他现住在宜园。这是广西当局接待各地来的代表的宾馆。你自己去找他好了。”我按照约定时间找到了李济深。李身子长得很胖，个子很矮。我到他的会客厅后，他热情地同我握手座谈。他立即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问好。我答：很好！谢谢你的关怀。我同他座谈了约一小时，其内容与对李宗仁所谈的基本一样。在座谈中他没有多说话，只表示说：“中共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正确。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来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进行斗争，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

我们民族的危亡。蒋介石个人独裁，对日妥协投降，不顾民族之存亡。我是一贯反对他的。‘两广事件’的发生原因就在于此。”听到他说这几句简单的话，似乎他是愿意同我党我军合作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的。我对他说：“李先生的主张很好，我很赞成。我们党很早就提出在国难当前，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把日寇打出去，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我想全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都是赞成的。”谈到此我就同他握手告别了。

我同李济深会谈后的第五天，胡鄂公与黄杰来看我。胡说：“李济深很进步，李宗仁等也很尊重他。我们对李宗仁要谈的什么问题，最好经过他去对李宗仁谈效果更好。林同志以后要对李宗仁谈什么问题可告诉我，由我同李济深谈好转告李宗仁，你意见如何？”我说：“中央是派我直接与李宗仁等商谈问题的，不应通过别人来做间接的会谈。我认为你提的意见不妥当。这样做更使李宗仁对我不满意。”我讲后，胡表现得很不满意而告别了。过了两天，胡、黄又来找我座谈，他们不让宣侠父来。胡对我说：“今天要对林同志谈些重要的问题。在这里谈不方便，是否可以出去到公园里谈谈？”我说：“好，出去外面座谈也好。”于是，我就同他俩到南宁公园去。一九二九年秋，我在南宁时也常常到这个公园散步。这地方我比较熟悉，就同他俩到一块人少来往的地方去座谈。这天胡鄂公的神情似乎不太正常，又表示出对我很关心的样子。他开口就说：“林同志这次来搞统战工作很好，可是广西当局对你有些怀疑，怀疑你是否是中共中央派来的。在这情况下，我们的意见是林同志能否先回去西北，把党中央指示你出来的工作任务交给我们来办。你如果不快离开广西，万一发生意外那就不好了。……”我听了他所讲的鬼怪话，则认定他是有意搞鬼，以制造谣言和威吓的恶劣手段来骗我走。使他能假用党

中央派来的代表名义进行活动。这无疑是对统战工作极为不利的。因此我就毫不客气而又严肃地批评他们一番。我说：“我出来经天津时，是我们的同志同李宗仁设在天津的秘密机关负责人商谈好了，并由他们先发密电给李宗仁等告知我要到南宁来，当李宗仁会见我时，他就说早已知道林先生要来的。这样他们对我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党中央是派我来工作的，我没有完成任务之前是不会离开广西的。你们没有权利代替我来进行活动的。你所提的意见是非常错误的。至于我会遭受什么意外，我是不怕的，如果害怕什么意外，我就不会经过遥远的敌占区来此了。我在这里进行工作，你们只能帮助我了解些情况，不许插手干预。不然的话，你们过后就不要同我联系。”经过对他们的批评，他们无话可说。我就走了。

过后我搞好一份向党中央报告的密码电报，亲自拿去要王公度代发，并把呼号和波长都告诉他。他满口答应一定会代发。这份电报的内容主要是：报告我已经会见李宗仁和李济深。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赞成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愿意同我们合作进行抗日救国。陈济棠已下台，逃居香港。广西方面仍继续搞‘反蒋抗日’活动。他们反蒋是真，但是否真正抗日不太清楚。在我未到南宁之前，香港党组织已派胡鄂公、黄杰、宣侠父来桂进行统战工作活动。胡在工作上对我没有帮助，反而造谣说李宗仁等对我有怀疑，要我先回西北，把任务交他们去办，我坚决反对。他们可能是假冒中央派来的代表的名义，骗李宗仁等进行活动的。这事情如何处理，请指示！这份电报交王公度代发后，约一星期之久，王来告诉我：“至今还联系不上，什么原因不清楚……”。这时，我很焦急，拟赴天津找王世英同志。凑巧得很，过两天王世英同志来到南宁同我会晤。王同志说：我担心你是否已安全到达南宁，所以特来看你，并了解两广的情况。我便

告诉他来到南宁后的经过和进行工作的情况。同时我把胡鄂公、黄杰胡闹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他。世英同志说，究竟是什么人派他们出来的，我也不清楚。我说，宣侠父表现较好，可是受他们控制，也无能为力。王世英同志说，不要理睬他们好了。他们绝对不是中央派出来的。我说，最近他们都不敢到我处了。谈了一小时多，王世英同志就走了。过了三天，世英同志又来同我座谈。他说，最近广西情况还没有新的变化，我准备赴香港后回天津。我说我留下继续工作，你回去也好，你回到天津后，请你把广西的情况和胡、王胡闹的行为报告中央好了。世英同志不几天就回天津了。

八月中旬，我听到蒋军已派大兵来包围广西，南宁市面上也有些混乱，有些商民逃离南宁，广西的纸币大跌价。听说不少人都争先恐后地把广西纸币去换港币。也听说蒋介石收买广西的空军，有一些空军人员和飞机逃走了。在旅店中的职工都纷纷议论这种情况。有一天，王公度到我处来座谈。他说：“有些事情要同林先生商谈一下，是否可以？”我说很好。他说：“最近蒋介石已派兵来威胁我们，无非是迫我们停止‘抗日救亡’活动。目前情况比较紧迫，如何对付他们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林先生对此有什么意见？”我思考了一下，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党的方针是‘迫蒋抗日’，如果南方打起内战来，对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是不利的。因此，我就对他说：“中国不断打内战，我们党多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其目的是为着坚决反对日寇的侵略，维护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而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大打内战。这是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动政策。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还是以和平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为上策。不过在谈判中，必须以迫蒋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为前提。并立即把蒋军围攻广西的军队全部撤走，这是主要的条件。这是我

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我想和平解决后，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加强各方面抗日力量的团结，‘迫蒋抗日’也是可能的。请你把我个人的意见转告你们李总司令。”王公度说：“林先生提的意见很好，我一定向李总司令报告。”我俩简单谈了这一些，他对我表示感谢就走了。大抵过了十几天，蒋方与广西当局经过和平谈判，在九月上旬得到和平解决了。但是谈判的具体内容我不太清楚。和平解决后，南宁的社会秩序逐渐转为安定。

蒋、桂两军经过和平解决问题后，九月中旬，我就离开南宁赴天津。当离开南宁之前两天，久不来见我的胡鄂公和黄杰到我住处来。胡一见我就说：“广西当局与蒋军经过和平谈判已取得和平解决。李济深先生写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他托我携来给林同志亲自带去，转呈给毛主席”。胡把信给我看。这封信只有三百个字左右，基本内容是表示对我们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护，诚意地同我们合作进行抗日救国运动。最后提出今后在军事行动上同我红军密切配合。我看完这信后对胡说：“我同意把李济深的信带去呈给毛主席，这是不难办到的”。黄杰对我说：“是否可以把这封信缝在你上衣的袖子上，我会缝得好，我代你缝好吗？”我答：“不要缝在衣上，我是有办法带去的。”胡笑着说：“能带到就好了。”这次胡、黄对我的态度老实多了。他俩只笑着，不多谈什么问题就走了。我要离开南宁的消息，可能是王公度告诉他们的。我当时认为把李济深给毛主席的信藏在身上是不妥当的，万一被敌人查出来，就麻烦了。我决心把这封信的内容念熟，就把它烧掉。到延安后写出来呈给毛主席就是了。

九月中旬，我离开南宁后经香港赴澳门。我从兄云旭斋已通知我妻陈英同志和小女泊娟到澳门住着。陈英同志一九三〇年参加红七军后，因为怀孕，组织上决定她不要随军到江西中央苏区，不得已回乡务农过生活。她坚决要偕我回红军中工作。我同

意。就借她离开澳门经上海到天津。到天津后的第三天，我找到了王世英同志。他留我们在天津逗留几天。他要我亲自带呈给党中央的密件。办妥后我们就离开天津乘火车到西安。到西安住了一段时间，才经过申伯纯先生的关系找到张纯清（即张文彬）同志。纯清同志当面告诉我说：“叶剑英同志现在西安，你是否快点去看他？”我很高兴地答：“我出来工作已经几个月的时间，我往南方工作的情况必须快点向中央汇报。请你对他谈好，约定地点和时间，我就去看他好了”。我把北方局送给中央的密件交给张纯清同志，由他转呈中央。过了两天，我偕张纯清同志去看叶剑英同志。见面时他就欢笑着对我说：“你这次出去工作，现在顺利地回来，很好！”我就详细地把去广西进行统战工作经过的情况向他汇报。最后又把李济深给毛主席的信全文写出来呈给他，并请他转呈给毛主席。叶帅说：“你的记忆力很好，这信由我转呈给毛主席好了”。

一九三六年，我们红军抗日先锋队渡黄河东征，所向皆捷，全国响应。正当抗日先锋队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侵略军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以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开入山西，协同山西军阀阎锡山，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军队及国民党陕北军队，向我陕甘红色区域进犯，扰乱我抗日后方。蒋介石还妄图以大兵围攻消灭我们红军，他亲自到西安来坐镇指挥作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及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国民党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赞同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仅拒绝联共抗日，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以残暴手段来屠杀抗日的革命群众。在这紧急的形势下，张、杨两将军忍无可忍地联合行动，毅然把天怒人怨的蒋介石逮捕起来。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著名的

“西安事变”。^{〔2〕}事变发生后，我看了一些传单，才明了这次事变的真相。这时西安广大人民群众得到逮捕蒋介石的消息都非常高兴。

在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企图借西安事变来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他们布置国民党军沿陇海路进攻陕西，并计划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代蒋介石的地位，使日寇入侵更为方便。在这紧急的关头，我们党中央为着粉碎亲日派的阴谋，则提出和平谈判的主张，得到了张、杨的同意。当时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后被释放回南京去了。

从此全国抗日运动不断发展，以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爆发，全国出现了全面抗战的高潮。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杨与我们红军的统战关系更好。他们命令部队把过去拘捕我们红军的人员全部释放出来，并给我们许多方便，在西安办训练班。党组织派我参加了这项工作。被放出来的同志受训练后，分别送上抗日前线，为战胜日寇，解放全中国而继续战斗。这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后，一九三七年二月间我欢快地回到了延安。

一九八二年春书写于广州

〔1〕“两广事变”，是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广东军阀陈济棠等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间，假借“抗日救国”的口号，联合反蒋。同年八月，这个事变被蒋介石用分化利诱手段所瓦解。

〔2〕西安事变后，张、杨对蒋介石所提出的谈判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三）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四）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五）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六）与同情中国抗日的

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七）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3〕上海爱国领袖，是指上海抗日爱国运动的七个领导者。即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蒋介石政府拘捕，一九三七年七月才被释放。

回忆我在延安十年和在“解总” 同美蒋斗争的经过

林 仲

一、延安十年事 峥嵘岁月稠

一九二八年初秋，我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伯力基层金属矿区工作的两年合同期满，几经周折，才获得回国。回来后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一九三一年党中央派我到福建省委工作，当我调到福州工作时曾被敌人逮捕入狱。卒因查无实据，被关数月获释。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我的行踪已引起敌人注意，只好先到上海，同年秋天到达印尼苏门答腊，以教学工作做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以后又返上海。一九三四年春第二次到菲律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号召下，菲律宾华侨掀起支援抗日高潮。后来，王明主持的巴黎《救国时报》竟诬指高承烈和我是托派，操纵了菲律宾共产党内的某些人对我们进行了恶毒攻击，对菲律宾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破坏作用。为此，菲华侨局认为有必要弄清楚《救国时报》事件的真相，派我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以菲律宾华侨局代表名义到延安，请求中共中央查清巴黎《救国时报》诬指我等为托派的问题。此事，后来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